



引用格式:张胜利,翁伟波.共同富裕: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5):64-71.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2.05.008

文章编号:2096-9864(2022)05-0064-08

共同富裕: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alistic path of datong ideal

张胜利,翁伟波

ZHANG Shengli, WENG Weibo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大同社会,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从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小国寡民”、孔子“天下大同”思想到近代康有为“极乐世界”、孙中山“天下为公”,从农民起义高举“等贵贱、均贫富”旗帜大胆尝试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试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这一理想不懈奋斗。今天站在全面小康社会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大同社会,走共同富裕道路是通往大同社会的现实路径和历史必然,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分配机制酝酿成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着共同富裕必将成为现实。

关键词:

天下大同;
共同富裕;
小康社会

[收稿日期]2022-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ZZ007)

[作者简介]张胜利(1968—),男,河南省汝南县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翁伟波(1986—),男,河南省信阳市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数千年来,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大同社会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从春秋时期老子“小国寡民”、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到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平等”“天补”“均平”的政治尝试,从清末太平天国“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的政治纲领到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对大同理想的系统构建,无数先辈前赴后继,不断从理论上完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描绘,在实践中接续尝试推动构建大同社会的理想方案。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些理想中的一些原则从来都没有在现实社会中贯彻和实施过,直到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提出民生主义的经济纲领,才使得大同社会的一些原则得以贯彻实施。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3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们才真正找到了到达大同世界的正确道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正在朝着共同富裕的更伟大社会目标坚实迈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目标。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大同社会,是对未来理想的现实描绘,共同富裕则是对历史逻辑的当代阐释。本文拟立足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理想与实践,透过历史逻辑,领悟现实意蕴,将共同富裕这一时代主题置于大同社会这一历史背景下解读,从历史角度剖析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共同富裕及其在当代实现的现实性和必然性,从而更加坚定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念和决心。

一、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大同”一词始见于《礼记·礼运》,“同”的

本义是人们坐在帐篷里说话、吃饭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家有事共同商议、有饭一起吃的意思,它反映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情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出现了剩余,人类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人们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正如列宁所说的:“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2]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试图将人类社会止步于原始社会以期实现共产主义是徒劳的。于是,如何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社会发生激烈动荡,面对这种社会现实,老子提出反对财产占有、反对压迫、反对战争,提倡“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均主义;提倡“无为而治”,顺乎自然,追求小国寡民这种“至治之极”的理想社会。在《论语·季氏》中谈到季康子想要征伐颛臾时,孔子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有国者”是诸侯,是国君;“有家者”是大夫,是拥有采邑的家族。孔子强调,无论是诸侯的国还是大夫的家,都不怕贫,怕的是不均;不怕人少,怕的是彼此不能相安。这里的“贫”和“不均”指的是财富占有问题,“寡”和“不安”指的是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各个统治集团的关系问题。这在表面上看是讲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资源分配问题,但其结论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均无贫”是不区分阶级、无任何条件限制、人人平等的摆脱贫困的状态,这一思想由于出自孔子之口,后世凡是涉及分配的问题人们都会拿起这一武器与其他阶级作斗争,其对后世影

响极大。《礼记·礼运》这部“约为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问答的著作”^[3],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大同社会理想,描绘了一幅清晰美好的社会蓝图。大同社会的总原则是“天下为公”,以公有制为基础,是同“天下为家”的私有制完全相对的,财产公有是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大家各尽其力,为社会劳动。在这种社会中按性别、年龄和社会需要进行分工,选贤任能,实行社会民主;没有盗贼,没有战争,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友爱,诚实无欺,各得其所,过着美满幸福太平的生活。大同思想集中和总结了古代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它否定私有制,反对剥削压迫,消灭腐败黑暗,成为后世起义农民、进步思想家、革命家反剥削反压迫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旗帜,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大同理想而不懈奋斗。吕不韦及其门下客在《吕氏春秋》一书描绘了一幅天下公平的理想画卷:“昔先圣王治之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4]也就是说,古代圣王治天下,首先要讲公,实行男耕女织,君民并耕,在这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人人参加农业生产,“凡主之立”也要讲公,只有“法天地”之大公,才能称得上“圣王”。东汉末年,张角以道教经典《太平经》中的“万年太平”思想为指引,发动黄巾起义,试图实现一个“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理想社会,最终失败。魏晋时期政治腐朽、社会动荡,一批有为之士痛恨社会的黑暗和无道,提出了“无君论”的政治主张。阮籍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猛烈抨击君主制度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古代社会描绘成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主张建立一个无君社会。陶潜在其所写的名篇《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没有政

府、没有官吏,没有租税和徭役,也没有战争的无君国理想社会。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自封“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动起义,表达了当时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北宋时期,理学大师张载提出建立一个“均平”的乌托邦社会,其实现途径就是实行“井田制”。他认为,“治天下不由井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5],明确指出实行井田制的目的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回到领主经济中去,而是要通过对土地所有权平均分配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张载所说的井田不分上地、中地和下地;无菜田,无休耕;无休洫,无公田,一夫百亩,一视同仁;农民全年辛勤所得除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赋税外,其余全归自己所有,激发了人们对美丽田园生活的无限憧憬。宋代农民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口号,涌现出了像王小波、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集中体现了农民试图摆脱封建不平等地位的悲惨命运和建立大同理想社会的愿望。清代龚自珍生逢封建社会衰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之时,他主张社会改革,指出社会一切罪恶和混乱的原因在于贫富不均,主张实行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基础的财富平均主义。龚自珍在其所写的《平均篇》中,认为治理天下最高的理想是使人们得到比较平均的分配,要避免国家灭亡,必须消除贫富不均现象,根本办法是从分配土地入手,并在土地分配后随时加以调剂,使富者不会太富、贫者不致太贫。

二、中国近代大同理想的反思与探索

到了近代,中国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殖民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批受西方思潮影响睁眼看世界的开明知识分子试图从中国传统大同政治理想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理想方案。康有为受西方资产阶级和空想社

会主义的影响,对大同社会做出了不同于传统儒家的新的阐释,在《大同书》中对未来社会的最高理想进行了系统阐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阶段,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升平世”,但还未到达“太平世”。他说,“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才是真正的“极乐世界”^{[6]71},未来整个人类将进入大同时代,那是一个没有私产、人人平等、个个幸福,消除各种苦难的和平世界:“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行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先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致极乐。”^{[6]52}太平天国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口号,尝试以国家意志推动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天国,以求彻底摆脱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太平天国运动是历代农民战争中水平最高的一次,大大发展了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思想,由于缺乏对未来社会的科学理论做指导,以及无法突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这一理想最终也未能实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口号,试图“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期实现大同理想。他组建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试图以“毕其功于一役”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问题。他曾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355}实行民生主义的具体纲领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不是普遍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而是社会平均享有土地的权利,即“共产”,这样既可以防止地主剥削,又达到节制资本的目的,从而防止地主变为资本家。孙中山想通过民生主义建立一个没有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反映了被

压迫人民对于没有阶级的美好社会的向往,其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和为实现革命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着继任革命者接续奋斗、勇往直前。

纵观中国古代和近代大同理想与实践,无数仁人志士对大同理想的理论阐释和实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而进行的积极探索,反映了农民阶级为改变自身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现状而做出的伟大尝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和期盼。但是,由于阶级、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可能代表先进的社会阶级,知识分子也无法突破时代的束缚,封建地主更不可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大同理想仅成了人们在困顿之余的聊以慰藉的精神食粮,而无法浇灌成为现实的果实,他们把大同之世的内容设计得愈具体、愈细致,就愈发陷于空想。与此同时,大同理想历经数千年的传播已经扎根在中国亿万群众心里,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持之以恒不懈追求的梦想,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尤其是面对近代列强入侵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打破旧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成为新的时代课题。经过历史的抉择,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人民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历史性地实现了人人平等,大同理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实现可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经济快速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取得质的飞跃、迈向新的历史台阶。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将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领中国人民昂首阔步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进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大同理想社会。

三、大同理想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认为,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才有可能“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7]。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注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将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8]。这实际上是与大同社会理想相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出了科学准确的分析与研判,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现实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公有制经济的确立,为实现公平公正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我国发展的目标,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9],提出“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界”^[10]。改革开放以后,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大同思想文化基础上,邓小平赋予“小康”“大同”等传统政治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将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努力方向,制定了“三步走”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同社会第一次真正迎来了成为现实的时代契机。进入21世纪,江泽民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11]。胡锦涛同志围绕发展和民生这一主题,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2]。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国社会数千年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13],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规划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从温饱到全面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站在全面小康社会新起点上,大同社会理想第一次真正迎来了实现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今天中国正阔步走在通往大同社会的康庄大道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和必然选择,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也就真正意义上迈向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

1. 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性

(1) 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小康理想从古至今一直是国人追求的目标。早在春秋时期,“小康”一词就在《诗经》中出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描述表达了先民对富足安乐的美好生活的向往。《礼记·礼运》更是对“小康”社会理想做了明确和具体的阐述,这成为后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小康社会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尤其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用“小康”一词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六大,党中央紧紧围绕小康社会目标稳步推进,中共十二大首次将小康作为经济建设总目标实施规划,中共十三大制定了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中共十四大在人民温饱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中共十五大又提出新的“三步走”战略。进入新世纪,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中共十七大全方位多角度对全面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更加清晰、内容更加具体、施策更加精准。2021年,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14]

(2) 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从经济体量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保持近9%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几百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产值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在经济实力方面,自2010年以来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位置,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我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创新型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全球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我国稳坐第一,2020年利用外资居全球第一,服务贸易我国稳居榜二。从发展韧性来看,在14亿人口中,有超过4亿并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每年以稳定的增幅持续增长,庞大的人口红利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具成长性的超大规模市场,发展后劲十足。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我国提出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不断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充分彰显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15]。

(3) 分配体制机制酝酿成熟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6]托马斯·皮凯蒂指出,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是造成根源性不平等的温床,认为“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17]。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8]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统

筹各方面利益,初次分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二次分配中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注重社会公平,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均衡发展。通过各种手段调节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在社会中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公平合理的收入模型,保持不同群体的收入合理,实现二次分配的公正公平。健全三次分配机制,积极吸纳鼓励企业和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分配中来,通过社会力量调节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无法顾及的部分,以多种渠道最大限度地调节社会财富,实现收入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分配领域的不断探索,形成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环环相扣的分配机制,在保证效率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这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完善的分配制度保障,避免社会出现两极分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 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然性

(1)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首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明确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这一阐释从根本上指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途径,实现步骤是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社会财富如何分配问题,从本质上同以往任何剥削社会划清界限,成为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指针和靶心,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2) 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我国宪法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制度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经济的性质属“公”而不是属“私”,这就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经济制度保证。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并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平等对待各种社会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效能,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在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营造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良好社会氛围,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提高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3)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第一次提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20],并将其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写入党章。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继续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创造性地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进入21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捍卫者和守护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发展的第一位。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4],明确提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21],做出“人民就

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人民至上的历史论断。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实现共同富裕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4)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人类社会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运行的,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超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包含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马克思将人类社会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属于第三个阶段的社会形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能力和财富,人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22]。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其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三大差别最终消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下,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解决,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成为新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主要矛盾,站在全面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实现共同富裕的脚步越来越近,国家正稳步向共同富裕的更高阶段迈进,社会也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以实现社会大同。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9卷[M]. 北京:中华书

- 局,1986.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6-7.
- [3]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331.
- [4]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24-25.
- [5] 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248.
- [6] 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3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9.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5.
-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
- [11]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61.
- [12]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91.
- [13]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EB/OL].(2021-10-15)[2022-05-03].www.gov.cn/xinwen/2021-10/15/content_5642821.htm.
- [1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EB/OL].(2021-09-28)[2022-05-03].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8/content_5639778.htm.
- [16]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 [17]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1.
- [18]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
- [1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2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98.
- [22] 舒建华.论共产主义概念的三个维度: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0(6):14.